

父母的政治身份是否有助于子女进入“体制内”

陈刚,卫艳青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体制内”工作由于“工作稳定,福利优厚”,成为中国新一代年轻人首选的就业去向。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父母的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且其可主要由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就业的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来解释。同时,除去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政治权力效应也可部分解释为何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这一核心“体制内”部门就业的概率。

关键词:政治身份;就业;身份传递;人力资本;体制内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17)06-0079-09

一、引言

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所有资源都按照政府计划进行配置。在经过30多年的体制转型之后,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毋庸讳言,政府部门迄今依然在各个领域设置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掌握着大量资源配置权。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就业部门通常被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其中,“体制内”就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模式的延续,一般指由财政供养的就业岗位,主要包括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

虽然与在市场经济中兴起并壮大的“体制外”就业相比,“体制内”就业的工薪收入并不算高,但它却因为“工作稳定,福利优厚”而被誉为“铁饭碗”^①。并且,“体制内”部门要么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要么是管理国有资产的代理部门。“体制内”工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行政审批权和资源配置权等“特权”,因此,进入“体制内”成为中国新一代年轻人首选的就业去向^{[1]②}。近10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度持续升温,已然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考”,这一现象便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体制内”就业的狂热偏好。数据显示,国家公务员参考人数由2003年的8.76万增长到了2012年的96万,录取比例由2003年的16:1增长到了2012年的74:1。在2013年,随着中共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并强力推行反腐运动之后,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度有所降低,但2015年报考人数仍然达到了129万人,录取比例依然高达58:1^③。

收稿日期:2017-06-27 修回日期:2017-10-18

作者简介:陈刚(1981—),男,四川内江人,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卫艳青(1992—),女,河南平顶山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①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转引自:<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403/c1008-26794393.html>);2011年,《公务员法》实施5周年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国600多万公务员5年总共辞退了4778名,辞退率0.08%(转引自:<http://news.sina.com.cn/o/2014-03-22/011929764835.shtml>)。

②中国最大的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的年度最佳雇主调查报告显示,2001—2013年愿意去体制内就业的受访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5%、54%和49%。虽然2014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6%。数据摘自: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12/13/c_127300605.htm。

③数据摘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8/c1001-23254296.html>。

在标准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空缺的就业岗位,就存在就业岗位的配给,最有效率的配给方案是将岗位分配给生产率最高的劳动力,或者说最适合这个工作岗位的劳动力。由于人们对“体制内”就业的狂热偏好,中国“体制内”部门的就业存在较为明显的配给现象,但它却可能背离了效率原则。因为除了劳动生产率,家庭背景对劳动力能否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可能也有重要的影响。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官二代”称谓,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象。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微观调查数据,以中共党员来表征政治身份,评估父母的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且其可主要由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就业的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来解释。同时,除去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政治权力效应也可部分解释为何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这一核心“体制内”部门就业的概率。本文可能是首篇研究父母政治身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文献,研究证实了家庭背景在劳动力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当前所存在的职业分层和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补充和完善了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家庭行为决策的研究文献。

二、文献综述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部门不仅掌握着大量的资源配置权,而且在许多市场领域都设置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因此在中国,享有相应政治关联的个人或组织往往也享有了一定的资源配置和行政审批等“特权”,而政治关联将如何影响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这受到了学界和决策部门的极大关注。

在企业层面,企业享有的政治关联可能同时具有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2]。其中,信息效应是指享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也是经营效率更高的优质企业,因此,企业可通过享有的政治关联向其他市场主体发送其是优质企业的信号,降低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获取所需资源;资源效应是指享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可以凭借与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间的良好关系,获得政府部门给予的优惠资源和优惠政策。通过研究大量公司和企业数据发现,政治关联在诸多方面促进了企业发展,包括:提高了企业的信贷获取能力,具体表现为获得的贷款金额提高、贷款成本降低和债务期限延长等^[3-5];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6-7];帮助企业突破行业管制壁垒^[8-9];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救助和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10-12];使得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得到了显著提升^[13-16]。

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诸多收益,这对微观个人而言可能同样是适用的。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下,中共党员往往享有更多的政治关联,现有文献一般将中共党员身份作为个人享有政治关联(或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中共党员身份能否为个人或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则是现有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Walder^[17]指出,党员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回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规则,目的是以此来保障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Li and Walder^[18]把党员身份视为一种政治资本,党员往往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进而有助于他们提高自己的利益。Knight and Yueh^[19]使用2000年7500名城市劳动力数据研究发现,党员身份为个人带来了显著的收入溢价,在控制了劳动力的年龄、教育和工作部门等变量之后,党员的收入要比非党员高出13%左右。Appleton *et al.*^[20]使用连续4轮(1998年、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中国城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党员身份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工资,但党员带来的工资溢价随时间有所下降。Li *et al.*^[21]则认为,党员身份对个人收入的正向影响可能是由未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造成的。他们使用双胞胎数据并采用组内固定效应模型消除未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之后发现,党员身份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了。李爽等^[22]使用1995年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研究发现党员身份显著提高了收入,且党员的回报随时间并未发生变化。刘和旺和王宇峰^[23]使用2005年中国家庭综合调查(CGSS)数据也发现,党员身份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收入,但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党员的工资溢价在逐步下降。

党员身份除了能给自己带来工资溢价之外,还可能凭借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利用所掌握的组织资源和政治权力为其家庭成员谋求福利^[24]。使用2005年CGSS数据,杨瑞龙等^[25]以父亲退休这一外

生冲击事件为“准”自然实验,估计了父亲的党员身份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发现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收入。李宏彬等^[26]使用中国大学生毕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官二代”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比非“官二代”学生平均要高13%左右,且这一差异不能被学生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程度、学生的考试成绩、就读大学的质量以及学生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所解释,这意味着父母的政治资本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叶晓阳^[27]使用2003年CGSS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母的政治资本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择校概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子女的择校费支出。

由上述文献可知,在中国,政治身份不仅可能为个人带来可观的收入溢价,而且有政治身份的个人还可能利用其所掌握的组织资源和政治权力,为其家庭成员谋求福利^[24]。现有文献重点讨论了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收入和子女教育(择校)的影响^[25-27],而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却未能得到重视,所以厘清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劳动力所处行业的平均收入对劳动力收入有重要影响,因而研究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可能有助于厘清父母政治身份影响子女收入的具体机制。其次,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最主要的内容,职业分层的固化也是社会不公平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可能为中国的职业分层和社会分层现象提供新的解释和证据,进而为促进职业流动和社会公平提供相应的启示性含义。

三、父母政治身份与子女“体制内”就业:理论预期

梳理现有的相关理论,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可概括为身份传递、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力3种效应。

首先,身份传递效应是指父母与子女间的政治身份可能存在代际传递,进而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按照同群效应(Peer Effects)理论的预期,来自同一个家庭内部的各个家庭成员,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相近,进而可能使得他们的偏好相似,包括政治信仰也会非常接近。因而,对于那些父母是党员的家庭来说,其子女是党员的概率也相应更高,并进而使得子女有更高的概率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因为,在政治上是否忠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体制内”部门选拔任用人才的一项重要考察条件^①,而党员身份则是个人显示其政治信仰和政治忠诚的最强信息。

其次,人力资本效应是指父母政治身份可能会影响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可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Li *et al.*^[21]指出,党员身份本身就是个人有更高能力的体现,即党员本身可能比非党员有更高的能力。如果党员的确比非党员有更高的能力,由于能力存在基因遗传的代际传递^{[27]②},意味着党员父母的能力将会部分遗传给子女,使得父母是党员的子女也相应有更高的能力。同时,党员父母可能本身也比非党员父母更重视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得父母是党员的子女比父母是非党员的子女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现有文献研究发现,父母的党员身份不仅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择校概率^[26],而且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受教育水平^[2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观点。

最后,政治权力效应是指具有相应政治身份的父母,往往也享有一定资源支配权和政治权力,这将有助于其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在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往往意味着能掌管一定的政治权力,即便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党员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从而间接地享有某些政治权力^[29]。因而,党员父母由于拥有一定政治权力,意味着他们也相应享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源,这有助于其子女获取进入“体制内”就业的信息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拥有一定政治权力的父母,还可能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进行寻租,以直接帮助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杨瑞龙等^[25]的研究显示,党员父母通过权力寻租以提高子女收入的机制可能确实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预期父母的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有重要影响。鉴于父母的政治身份可能通过以上多种机制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因此在经验识别中需要使用合

①中国的公务员考试中,有相当部分岗位仅限党员报考,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公务员选拔任用中对政治忠诚的高要求。

②Plug^[28]使用1992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母能力的55%~60%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子女。

适的策略。我们将采取在回归方程中逐次纳入衡量子女政治身份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以检验父母政治身份可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各种机制。

四、数据来源

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项目,评估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CGSS2010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民委员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在具体估计中,我们只从CGSS2010调查中提取了劳动力年龄范围内的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假设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由如下方程来决定:

$$P(\text{“体制内”就业}_{ij} = 1) = \Phi(\beta_1 \text{ 父母政治身份}_{ij} + BX_{ij}) \quad (1)$$

其中,下标*i*和*j*表示第*i*个城市的某个人*j*。被解释变量是衡量个人是否正在“体制内”就业的哑变量,若个人是在“体制内”就业,被解释变量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根据CGSS调查中关于个人目前工作性质的调查信息,来确定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是否正在“体制内”工作。具体而言,若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单位类型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抑或是国有或国有控股性质,我们将这种情况视为在“体制内”就业。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体制内”部门可以划分3个层次,其中,政府部门保留传统特征最突出,是最典型的“体制内”部门,处于最核心圈;处在中间状态的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保留传统特征相应最少,处于最外围^[30]。

核心解释变量是衡量父母政治身份的哑变量。遵循现有文献中的普遍做法,我们使用中共党员身份来表征父母的政治身份。一般来说,党员往往掌握了一定的行政权力,即便没有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掌握着行政权力的人,从而间接地享有某些行政权力^[29]。按照CGSS2010调查中对受访者父母政治面貌的回答,父母是中共党员的受访者,其父母政治身份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X*是其他可能影响个人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控制变量矩阵,其中包括以下主要变量:①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②年龄,即受访者的周岁年龄;③民族,汉族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④受教育程度,赋值为0~6的整数,分别对应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等由低到高的教育层次;⑤身高(单位:cm);⑥健康,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赋、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等受访者自评的健康状况;⑦户籍,非农业户籍赋值为1;农业户籍赋值为0;⑧中共党员,中共党员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

表1显示,父亲是党员的受访者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显著高于父亲是非党员的受访者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其中,父亲是党员的受访者中有5.9%在党政机关就业,有13%在事业单位就业,有10.1%在国有企业就业;而父亲是非党员的受访者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分别只有2%、7.1%和5.6%。同时,母亲是党员的受访者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也显著高于母亲是非党员的受访者。其中,母亲是党员的受访者中有6%在党政机关就业,有14.4%在事业单位就业,有14.1%在国有企业就业;母亲是非党员的受访者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分别是2.6%、8%和6.1%。上述结果初步印证了前文的理论预期,即父母的党员身份有助于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

父母是党员的受访者自己也是党员的比例和受教育程度,都显著高于父母是非党员的受访者。其中,父亲是党员的受访者中有18.9%自己是党员,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分是3.087(高中以上);父亲是非党员的受访者中只有8.2%自己是党员,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分为2.296(略高于初中)。母亲是党员的受访者中有24.6%自己是党员,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分是3.577;母亲是非党员的受访者中只有9.8%自己是党员,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分为2.404。这似乎说明,父母与子女间的党员身份可能存在代际传递;同时,父母的党员身份也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父母是党员的受访者中有城镇户籍的比例,显著高于父母是非党员的受访者。主要原因是,子女的户籍主要由其出生时的父母户籍来决定,而父母的党员身份往往有助于父母在城镇正规部门就业并获得城镇户籍。父母是党员的受访者的身高,显著高于父母是非党员的,对此可能的

解释是,父母的党员身份能为父母带来更高的收入溢价,而更高的收入使得父母能够改善其子女在青少年时期的营养状况,进而使其子女在成年后有更高的平均身高。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量 | 父亲政治身份 | | | 母亲政治身份 | | |
|------|---------|---------|----------|---------|---------|----------|
| | 党员 | 非党员 | 差值党员 | 非党员 | 差值 | |
| 党政机关 | 0.059 | 0.020 | 0.039*** | 0.060 | 0.026 | 0.033*** |
| 事业单位 | 0.130 | 0.071 | 0.059*** | 0.144 | 0.080 | 0.065*** |
| 国有企业 | 0.101 | 0.056 | 0.045*** | 0.141 | 0.061 | 0.080*** |
| 性别 | 0.463 | 0.481 | -0.018 | 0.518 | 0.474 | 0.043 |
| 年龄 | 37.396 | 37.119 | 0.276 | 36.771 | 37.199 | -0.428 |
| 民族 | 0.899 | 0.900 | -0.001 | 0.919 | 0.899 | 0.020 |
| 身高 | 165.875 | 164.591 | 1.284*** | 167.144 | 164.743 | 2.402*** |
| 健康 | 3.991 | 3.910 | 0.081*** | 3.989 | 3.924 | 0.066 |
| 户籍 | 0.681 | 0.407 | 0.274*** | 0.794 | 0.447 | 0.347*** |
| 党员 | 0.189 | 0.082 | 0.107*** | 0.246 | 0.098 | 0.149*** |
| 教育 | 3.087 | 2.296 | 0.791*** | 3.577 | 2.404 | 1.174*** |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计量分析与讨论

(一) 父母政治身份与子女“体制内”就业

表2 是对回归方程(1)的 Probit 估计结果,表中报告的数值是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鉴于父母的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身份传递、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力等效应,为了在计量检验中能够分离识别上述3种效应,我们选择将父母党员身份、子女党员身份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等变量逐次纳入回归方程进行计量估计。第1列中只纳入父母党员身份及其他控制变量,而并未纳入子女的党员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等表征子女的政治身份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此时,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母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平均而言,父亲是党员身份的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要比父亲是非党员身份的子女高3.85%左右。

第2列中纳入子女的党员身份变量,子女党员身份变量的边际效应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党员比非党员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更高。更重要的是,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系数较之第1列下降了0.015,降幅高达39%。说明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存在明显的身份传递效应,因为在控制住子女的党员身份之后,父亲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影响规模明显下降了。同时,即便控制住子女的党员身份,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

表2 父母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影响

| 变量 | (1) | (2) | (3) |
|--------------|------------------------|------------------------|------------------------|
| 党员父亲 | 0.0385*** (0.0487) | 0.0235*** (0.0479) | 0.0029 (0.0465) |
| 党员母亲 | 0.0211 (0.0959) | 0.0073 (0.1009) | -0.0157 (0.1054) |
| 性别 | 0.0289** (0.0551) | 0.0134 (0.0603) | 0.0158 (0.0622) |
| 年龄 | 0.0194*** (0.0244) | 0.0169*** (0.0254) | 0.0183*** (0.0294) |
| 年龄平方 | -0.0003*** (0.0003) | -0.0002*** (0.0003) | -0.0002*** (0.0004) |
| 民族 | 0.0114 (0.0775) | 0.0088 (0.0696) | 0.0069 (0.0789) |
| 身高 | 0.0022** (0.0051) | 0.0015 (0.0049) | 0.0007 (0.0044) |
| 健康程度 | 0.0216*** (0.0277) | 0.0186*** (0.0263) | 0.0128*** (0.0279) |
| 户籍 | 0.2774*** (0.0968) | 0.2398*** (0.0928) | 0.1360*** (0.1002) |
| 党员 | | 0.1815*** (0.0496) | 0.0974*** (0.0616) |
| 教育 | | | 0.0787*** (0.0365) |
| 省份哑变量 观测值 | 控制 6284 | 控制 6284 | 控制 6281 |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经省份层面聚类修正的稳健标准差。

应仍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也意味着身份传递效应还不足以完全解释父亲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

第3列进一步在方程中纳入表征子女人力资本的教育变量。结果显示,教育变量的边际效应如预期一样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同时,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规模由之前的0.0235(第2列)大幅下降到了0.0029,说明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人力资本效应也是存在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控制住子女党员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等表征子女的政治身份和人力资本的变量之后,父亲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了,意味着政治权力效应可能并不是父亲党员身份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概率的重要机制。

(二) 父母政治身份与子女在党政机关就业

之前的回归分析发现,父亲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这可主要由父亲党员身份的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来解释,而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体制内”就业的政治权力效应未能得到检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力效应不存在。事实上,现在社会上流行且被普遍接受的“官二代”称谓,其本身就意味着父亲党员身份会影响子女就业和收入的政治权力效应是存在的。

鉴于此,接下来对“体制内”部门进行细分,并分别考察父母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各细分“体制内”部门就业概率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检验父母党员身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身份传递、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力效应的存在可能性。

表3是父母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党政机关等核心“体制内”部门就业概率的影响结果,变量纳入策略与表2一样。第1列中,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但母亲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党政机关就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

第2列在方程中纳入子女的党员身份变量。子女党员身份变量的边际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党员比非党员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更高,平均而言,党员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要比非党员高4.97%左右。同时,在控制子女党员身份之后,母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仍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则仍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只是其数值较之第1列中下降了0.0057,降幅高达32.7%,意味着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存在明显的身份传递效应。

第3列中进一步纳入表征子女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变量。教育变量的边际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另外,母亲党员身份变量的边际效应同样不显著,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数值较之第2列中进一步降低了,由0.0117下降到0.0078,降幅达33.3%,意味着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也存在明显的人力

表3 父母党员身份对子女进入党政机关就业概率的影响

| 变量 | (1) | (2) | (3) |
|--------------|-----------------------|-----------------------|-----------------------|
| 党员父亲 | 0.0174*** (0.0723) | 0.0117*** (0.0738) | 0.0078** (0.0675) |
| 党员母亲 | -0.0009 (0.1179) | -0.0039 (0.1333) | -0.0078 (0.1369) |
| 性别 | 0.0063 (0.1127) | 0.0004 (0.1212) | 0.0009 (0.1350) |
| 年龄 | -0.0013 (0.0446) | -0.0022 (0.0420) | -0.0022 (0.0463) |
| 年龄平方 | -0.0000 (0.0006) | -0.0000 (0.0006) | -0.0000 (0.0007) |
| 民族 | 0.0011 (0.1283) | -0.0021 (0.1306) | -0.0050 (0.1316) |
| 身高 | 0.0007* (0.0078) | 0.0005 (0.0084) | 0.0004 (0.0090) |
| 健康 | 0.0045 (0.0529) | 0.0028 (0.0542) | 0.0018 (0.0563) |
| 户籍 | 0.0607*** (0.1451) | 0.0475*** (0.1474) | 0.0287*** (0.1598) |
| 党员 | | 0.0497*** (0.0958) | 0.0348*** (0.0987) |
| 教育 | | | 0.0149*** (0.0598) |
| 省份哑变量 观测值 | 控制 6152 | 控制 6152 | 控制 6149 |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经省份层面聚类修正的稳健标准差。

资本效应。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控制住子女党员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等表征子女的政治身份和人力资本的变量之后,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依然在5%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都不足以完全解释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即父亲党员身份之所以会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概率,可能还存在显著的政治权力效应。

(三) 父母政治身份与子女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

表4是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外围“体制内”部门就业概率的影响结果。第1~3列报告的是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事业单位就业概率的影响。其中,第1列中没有纳入表征子女政治身份和人力资本的变量,此时,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母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平均而言,父亲是党员身份的子女进入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要比父亲是非党员的子女高1.57%左右。第2列中将子女的党员身份纳入回归方程,子女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时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不仅大幅下降了,而且变得不再显著。第3列进一步在方程中纳入表征子女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变量,子女教育变量的边际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仍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住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之后,子女的党员身份对其进入事业单位就业概率的影响也变得不再显著了,说明事业单位的人才选拔录用可能更看重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上结果意味着,父亲党员身份之所以会提高子女进入事业单位就业的概率,可能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效应造成的,而身份传递和政治权力效应不明显。

表4 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概率的影响

| 变量 | 事业单位 | | | 国有企业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党员父亲 | 0.0157 [*] (0.0676) | 0.0099 (0.0694) | -0.0033 (0.0714) | 0.0045 (0.0536) | 0.0008 (0.0540) | -0.0014 (0.0545) |
| 党员母亲 | 0.0043 (0.1096) | -0.0008 (0.1123) | -0.0158 (0.1216) | 0.0156 [*] (0.0836) | 0.0119 (0.0833) | 0.0088 (0.0838) |
| 性别 | -0.0086 (0.0809) | -0.0146 (0.0821) | -0.0144 (0.0846) | 0.0333 ^{***} (0.0853) | 0.0289 ^{***} (0.0854) | 0.0290 ^{***} (0.0857) |
| 年龄 | 0.0160 ^{***} (0.0291) | 0.0150 ^{***} (0.0301) | 0.0156 ^{***} (0.0354) | 0.0065 [*] (0.0335) | 0.0057 (0.0336) | 0.0058 (0.0344) |
| 年龄平方 | -0.0002 ^{***} (0.0004) | -0.0002 ^{***} (0.0004) | -0.0001 ^{***} (0.0005) | -0.0001 [*] (0.0004) | -0.0001 [*] (0.0004) | -0.0001 (0.0004) |
| 民族 | 0.0070 (0.1411) | 0.0068 (0.1398) | 0.0048 (0.1704) | 0.0053 (0.1416) | 0.0040 (0.1410) | 0.0037 (0.1383) |
| 身高 | 0.0007 (0.0053) | 0.0004 (0.0053) | -0.0000 (0.0049) | 0.0008 (0.0056) | 0.0008 (0.0055) | 0.0006 (0.0053) |
| 健康 | 0.0130 ^{***} (0.0286) | 0.0122 ^{***} (0.0286) | 0.0078 [*] (0.0355) | 0.0047 (0.0321) | 0.0039 (0.0312) | 0.0031 (0.0323) |
| 户籍 | 0.1557 ^{***} (0.0992) | 0.1433 ^{***} (0.0971) | 0.0659 ^{***} (0.0898) | 0.1028 ^{***} (0.0726) | 0.0943 ^{***} (0.0712) | 0.0804 ^{***} (0.0884) |
| 党员 | 0.0663 ^{***} (0.0592) | 0.0092 (0.0732) | | 0.0447 ^{***} (0.0557) | 0.0338 ^{***} (0.0737) | |
| 教育 | | 0.0561 ^{***} (0.0350) | | 0.0112 ^{***} (0.0355) | | |
| 省份哑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观测值 | 6284 | 6284 | 6281 | 6067 | 6067 | 6064 |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经省份层面聚类修正的稳健标准差。

第4~6列报告的是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概率的影响。第1列中,父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母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则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母亲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的概率,平均而言,母亲是党员身份的子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的概率,比母亲是非党员的子女高15.6%左右。第2列和第3列中逐次纳入表征子女政治身份和人力资本的变量,子女的党员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变量的边际效应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

党员身份和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提高子女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概率,但父亲和母亲党员身份的边际效应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意味着,母亲党员身份之所以会提高子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的概率,主要可由母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就业的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来解释,政治权力效应可能并不存在。

六、结 论

中国虽然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配置权,并在许多市场领域设置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因此在中国,政治关联在个人或组织获取相关资源和市场准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了父母的政治身份对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显著提高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且其可主要由父亲党员身份影响子女就业的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来解释。同时,除去身份传递和人力资本效应,政治权力效应也可部分解释为何父亲的党员身份会提高子女进入党政机关这一核心“体制内”部门就业的概率。

中国的“体制内”部门由于“工作稳定、福利优厚”而被誉为“铁饭碗”,并且“体制内”部门要么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要么是管理国有资产的代理部门,在“体制内”工作意味着可以掌握相应的行政审批权和资源配置权等“特权”。因此,进入“体制内”就业是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首选。本文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个人能否进入“体制内”就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拥有政治身份的父母可能通过权力寻租等非正常方式来帮助其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体制内”部门的就业机制,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 [1]潘晓凌,范承刚.年轻人到“体制内”去[N].南方周末,2011-03-01(A01).
- [2]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经济研究,2012(9):125-139.
- [3]KHWAJA A I,MIAN A.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 Rent provision in and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20(4): 1371-1411.
- [4]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9-21.
- [5]MICHAEL F, LIN C, LIU P, et al. Inside the black box: bank credit alloc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9, 33(6): 1144-1155.
- [6]FRANCIS B B, HASAN I, SUN X.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going public: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9, 28(4): 696-719.
- [7]BOUBAKRI N, GUEDHAMI O, MISHRA D,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2, 18(3): 541-559.
- [8]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9(2):106-118.
- [9]胡旭阳,史晋川.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J].中国工业经济,2008(4):5-14.
- [10]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1): 369-386.
- [11]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管理世界,2009(3):134-142.
- [12]潘越,戴亦一,李财喜.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贴[J].南开管理评论,2009(5):6-17.
- [13]FACCIO M, MASULIS R W, MCCONNELL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6): 2597-2635.
- [14]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130-141.
- [15]LI H, MENG L, WANG Q,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87(2): 283-299.
- [16]COOPER M J, GULEN H, OVTCHINNIKOV A V. Corporat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nd stock returns [J]. Journal of fi-

- nance 2010 65(2): 687-724.
- [17] WALDER A G.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57(3): 524-539.
- [18] LI B ,WALDER A.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 1949—1996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5) : 1371-1408.
- [19] KNIGHT J ,YUEH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8 ,16(3) : 389-414.
- [20] APPLETON S ,KNIGHT J ,SONG L , et al. The econom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the curious case of rising numbers and wage premium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45(2) : 256-275.
- [21] LI H ,LIU P ,MA N , et al.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Chinese twins [J].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53) : 1504-1520.
- [22] 李爽, 陆铭, 佐藤宏. 权势的价值: 党员身份与社会网络的回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否不同 [J]. 世界经济文汇 , 2008(6) : 23-39.
- [23] 刘和旺, 王宇锋. 政治资本的收益随市场化进程增加还是减少 [J]. 经济学(季刊) 2010(3) : 891-908.
- [24] 李路路. 社会分层结构机制变革与阶层相互关系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4) : 12-19.
- [25] 杨瑞龙, 王宇锋, 刘和旺. 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 [J]. 经济学(季刊) 2010(3) : 871-890.
- [26] 李宏彬, 孟岭生, 施新政, 等. 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 [J]. 经济学(季刊) 2012 (3) : 1011-1026.
- [27] 叶晓阳. “以权择校”: 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2(4) : 52-73.
- [28] PLUG E.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mother’s schooling on children’s schooling using a sample of adopte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1) : 358-368.
- [29] CHEN Y ,NAIDU S ,YUCHTMAN 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20th century China [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5(58) : 44-73.
- [30] 李强. 打破“体制内”的特殊利益 [N]. 新京报 2011-03-05(B20) .

(责任编辑: 康兰媛; 英文校对: 陈芙蓉)

Does the parents’ political identity help their children to enter the “system”?

CHEN Gang , WEI Yan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Chongqing 401120 , China)

Abstract: Being employed in the in-system organization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because of its “stable work , generous welfare”. By using of survey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CGSS 2010) , this paper has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ir children’s choice of being employed in the in-system organizations. It is discovered that parents’ political identit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employed in the core system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 and father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children than their mothers. After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s such as children’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education , fathers’ political identity st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employed in Party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 which means that “Guanxi”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nel through which fathers’ political identity improves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employed in system for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political identity; employment; identity delivery; human capital; in-system